

《陶渊明传论》:苦痛的现实感叹

——对李长之陶渊明批评的研究及思考

麻冶金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要: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是李长之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李长之的人格理想和民族文化理想,而且在整体上可以看出李长之精神上和文化选择的变化。从李长之身上的这种变化看,虽然其使用的是极具个性的个体性话语,但在本质上与现代所谓的个体性并没有根本的联系。在这些个体性话语中所体现的是不同于政治道路的审美化的民族文化建设道路。民国文人因政治活动而遭遇的精神压力或主动选择政治文化只是对实现民族文化不同道路的选择。所有的冲突都是在自晚清以来中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主题的表现。

关键词:《陶渊明传论》;“生命力”;政治选择;个体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15)03-0063-07

由于李长之在对待人生态度上与“京派”有着相近的态度,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一般将李长之视作“京派”文学的成员。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散文《艺术的人生》表达了这种取向。另一方面,在文化主张上,李长之和“京派”的主要成员也有着相似的主张,即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在李长之这里,以对浪漫主义理想人格理论的塑造和批评实践,主要体现为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追寻和积极的建构,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背景里,这种建构的欲望尤其明显,其《迎接中国的文艺复兴》充分地表明了这种理想。在其文学批评中体现出来的对个体人格精神的追求在根本逻辑上是归属于民族文化的视野之中,民族和国家的复兴和强大才是李长之人格批评的根本目的。在某种意义上,30年代的文学冲突实际上是“京派”与左翼对不同民族文化未来想象和实现方法的冲突,而不是现代个体人格与集体文化要求之间的冲突,强调政治活动压迫的个体意志为现

代个体人格形式,这实际上只是符合了历史的表面现象,但在本质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京派”文学团体中的个别成员转向延安政治文化场域,在根本观念上并没有任何冲突,只是实践方法上的选择而已。李长之正是这其中的一位。当他在向政治靠拢的时候,李长之的文学批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以强调“生命力”的浪漫主义风格为主的批评观念逐渐被带着政治文化意识的批评观念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李长之的精神上也遭受着自我与现实的冲突所带来的各种苦痛,他在这个苦痛的过程中一直在努力地调和自身已有的批评观念与现实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本文选取的是以李长之《陶渊明传论》为中心去研究李长之的陶渊明批评。李长之对陶渊明批评的兴趣已久,从30年代至1952年,李长之的陶渊明批评呈现出不同的时代和人生面貌。从这个角度切入,可以清晰地看到李长之在精神上的变化。

收稿日期:2014-10-25

作者简介:麻冶金(1983-),男,广东汕头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生。

一、陶渊明：从“我所理解”到“和时代传统的深深接递”

1930年代,李长之就已经谈论到陶渊明。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我所了解的陶渊明》,强调在陶渊明身上表现出来“‘强的生命力’的彻底性”。这“强的生命力”就在于陶渊明是意识到死的痛苦和悲哀,但他最终只剩下“爱”来求得生之“达观、乐天”。李长之把陶渊明的生命力完全封闭在他个体心灵之内,是自我内心的搏斗,而与客观环境没有任何关系,“他既否认一切,也放弃一切,如果再说他和朝代的更替有什么关心,那真是神经过敏了。”^{[9][19]}这其实已经很明显地看出李长之文学批评中所强调的“生命力”的本质。他深受德国文学和哲学的影响,强调使用精神史方法,但却忽略了精神史方法应当需要的联系、发展和整体的原则,而将具体的人的内心从时代背景中抽离出来作抽象的拷问,求取一个永恒的人的形象。

但在1947年的《陶渊明真能超出时代么?》里,李长之显然更加重视人与时代历史的紧密关系。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里,李长之已经注意到司马迁的浪漫主义精神与时代的精神气质之间的关系,但不是以历史的态度来看待司马迁的命运。他曾批评张资平的小说里主张“艺术上的时代”,从艺术上去表现和认识时代精神,去抓住普遍人性的内容,否定当时的革命文艺主张的时代的艺术。就文艺创作而言,这种态度自然是正确的,但对于文艺批评而言,如何看待时代与艺术的关系,就应当有另外的眼光。而该文从标题上已经可以看出,李长之对待艺术批评有了新的认识,不仅要求在艺术中把握时代,而看到了强调时代对艺术的限制,根本上在于看到了人的历史局限性。他这样表达对陶渊明的认识:“我也不否认他之高出时代,但我却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和他那一个时代的凑拍处:他决没有和他的时代切断,他决不是游离于那个时代之外,他乃是深深地和那时代的传统相接递着,他也隐隐地向后一个时代开拓着。——其实任何所谓超时代的人

物,我们都可作如是观!”“我们深深感到,一个人要‘完全’超乎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独怪有些人自以为能完全超出时代,以落伍鸣高,又有些人对古人的论断每每从一个时代里游离而出,而孤立地去看,所以不能不辨。”^{[31][425, 428]}可以隐隐地感受到,李长之对他早年单纯强调人性的浪漫主义的普遍性理念出发进行文学批评的观念是有否定的。

这或许与他认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历史观有密切的联系。1946年后,当原“京派”的人士纷纷回到北平重新打造自己的文化阵营时,李长之在黎锦熙的劝说下去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在政治态度上逐渐站在了共产党的立场上。在《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一书中,张蕴艳根据李长之次女李书的回忆整理了这个过程,此时的李长之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一个与以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为基本观念的德国古典思想相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对李长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发生或许与李长之在抗日战争颠沛流离的生活体验有关。他在撰写《韩愈》时就不断地提到韩愈的贫困给他的仕途之路造成的影响。对这个时代里生活现状的体验和反思也会影响到他的政治选择、文艺观念和思想观念。

政治选择十分明显,自不必多言。1948年国民党抢运京都学人时,李长之选择滞留北平,1949年北平解放时,表示出对新政权的衷心拥护。在文艺观念方面,李长之的改变是明显的,他也一反之前文艺批评注重生命力的表现而强调文艺的政治意义,写于革命文艺论战最紧张阶段的1948年的《〈诗经〉中的政治讽刺诗》可看做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不好确定李长之写作这篇与自己的文艺观念明显背道而驰的批评文字是出于怎样的缘由,更不能就此断定李长之的文艺批评发生了彻底的转向,这种情况或许并非是出自其内心的由衷之言。他1947年在一篇为陶渊明和庄子的文章所作的《序》里通过说出他对陶渊明态度的变化委婉地道出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他不愿意像陶渊明那样归隐山林,“放弃自己对于人生的

沉溺”，“宁愿多沾染一点泥土气”，但似乎感到现实的环境令他难以适从。“陶渊明却是忍耐又忍耐，最终才把不妥协的精神拿出来，而退到自己的堡垒里。在这一点上，我自己的性情却就更近于陶。”^{[3]429} 他将自己的现实体验投射到陶渊明身上，从年少时的乐观到青年时代的达观，而到现在的“觉得他的诗句是那样沉痛，几乎‘言尽意不舒’的情调充满了全书，竟再也寻不出十分快乐的影子了”，“只觉得陶渊明是有不得不的苦衷的，这不是高尚不高尚的问题，也不是逃避不逃避的问题，总之，这不仅是他自己的选择了，而是当时的‘现实’逼他就了这条道。从前还想为他辩护，现在觉得并不是理论问题，也无需乎辩护了，那是由于种种因素，遂自然而然，而产生了那种结果的。指责固然看得太浅，辩护也仍皮毛，现在所有的，却只是同情而已”。^{[3]429,430} 通过这段文字可以明显感觉到，李长之所描述的陶渊明的痛苦已经不是描写司马迁和李白时的浪漫主义式的痛苦。他认为陶渊明的痛苦不是理论上的认识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在“自己的选择”与现实的逼就之间的不得已的苦痛，他意识到需要采取同情的态度介入到历史人物中去。在后来的《陶渊明传论》中，李长之解释这种不得已的苦痛，在出仕与归隐之间，在生存压力与个性自由之间，陶渊明显然无法“超然”而唯有采取隐士般的沉默作消极的抗议，“对现实超然就是冷淡，冷淡就是不赞成——世界上哪里有真的超然呢？”^{[2]570} 对于情感胜于理智的李长之而言，在政治生活中难以超然的状况恐怕也使他的内心处于这种苦痛之中。

但在1948年前后，李长之的苦痛应该和沈从文、朱光潜等“京派”文人在精神上对中共政权的过分紧张有所不同，主要不是来自于政治立场的选择，而是来自于自己强烈的个性与自己所从事的所肯定的现实革命斗争之间的矛盾。他似乎逐渐意识到个体性情在革命斗争现实中的无能为力，感受到大环境对个体人格存在方式的裹挟，而李长之显然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强烈的个性融入到革命的大合唱中去。就在写完那篇《序》后的同月，任情率性的诗人李长之写了《陶渊明的孤独

之感及其否定精神》，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学杂志》上，提到陶渊明是“先似妥协，终于不妥协，这其中有一种否定力量的潜流”，尽管这其中做着伦理价值的挣扎，但他坚信“最后却是伦理的自我胜利”。可是这又是怎样的胜利呢？这不过是李长之自我的期许罢了，对于熟读古书的李长之而言，能够明白这极有可能只是个悲剧性的结局。这篇文章所坚持的依然是在李白司马迁那里所体现出来的“性格的悲剧”：“寂寞与孤独之感可说是和陶渊明的生命之深处永远相固结着的。……一个人到了四十岁而仍然不肯放弃的性格，当然是永不会放弃了。”“关于陶渊明这种性格，也不止我们看出来，他生时最好的朋友颜延之就已经看出来了，……就已经是‘物尚孤生，人固介立’了；……我们现在所作的，也就是充实这个意见，发掘这个意见，并且强调这寂寞和孤独之感的背后乃是一种悲剧性的否定精神。”^{[3]437} 可见，对于自认为性情近于陶渊明的李长之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自况和自期。他仍然坚持一直以来塑造理想人格的道路。他将这种人格理想寄托在陶渊明身上，将陶渊明塑造成为“鲁迅所谓韧性”的，“坚强的，壮美的，庄严而峻烈的人格”。这种人格必然具备强烈的否定精神，使自我得到现实伦理的肯定：“否定精神的另一面就是肯定自我，也就是自我人格中之伦理价值，这是一种真正的高贵的悲剧意识，陶渊明的不朽也就在此。”这种人格“是伦理的自我胜利”，“是确切切切的西洋美学上所谓的壮美或悲剧性的意义”。以此批评那些假借陶渊明作为与现实妥协的借口：“《红楼梦》中的袭人、妙玉就是这一个类型，中国近代文人中先以冲淡自居，终于落水的，也是这一个类型。”^{[3]435}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大能体会到李长之所说的从陶渊明诗句中所体会出来的苦痛，所呈现的反而是陶渊明的“寂寞和孤独”因为充盈着强烈的否定精神而显得生机勃勃，怎么会“寻不出十分快乐的影子”呢？他通过陶渊明的诗句里表现出来的孤独寂寞，认为“这让我们大可以想象，陶渊明是如何一人端着酒壶在那里独饮，又如何一人拄着手杖而踽踽独行，他会自己在那里会心微笑，他会自己

在那里慷慨高歌呢!”^{[3]436}这种反差更应该像是李长之内心世界的矛盾斗争的反映,他对鲁迅所谓的作“韧性的战斗”的肯定,更多的也是指向他的内心。这种情况与李长之认为的“性格”是一切事物变化中的“常数”,可以说,情感胜于理智的性格始终影响了李长之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而在这篇强调陶渊明的否定精神的文章里,李长之不过是通过这篇文章屏蔽他现实处境的尴尬而努力将其存在的意义在一种抽象的价值上得到肯定罢了。

而处理这种性格的冲突,李长之所采取的方法是走向现实的政治活动,从事革命的文艺事业。这种情况也必然带来文艺批评创作方法上的难以协调。李长之对中共政权的热烈拥抱使得他必须面对自己的创作个性与文艺政治性之间的矛盾关系。而他解决矛盾的方式是努力否定一直以来通过情感与理智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对个体生命力的浪漫主义精神的追求,而将人的情感和理智逐渐归进政治的价值和意义之中。以此看待中国古代的诗人也具备了不同以往的视角,在1947年6月23日的《世界日报》上,李长之发表了《诗人节献词》,其副标题是“论中国过去伟大的诗人都有一种共同特征,这就是民胞物与和忧国忧世的胸襟”。这与《孔子与屈原》一文中对“救世”精神的强调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该文却以这种“胸襟”作为评价诗人伟大的标准,认为具有这种胸襟的诗人才能“像一个最亲切的朋友一样,他道着我们的广泛的烦恼和苦闷”,而贬斥个人情感和心灵世界的表达,“在过去,不唯单单卖弄文字(虽然在那些伟大诗人对文字上也仍有高度的熟练)不被人重视,就是个人的恋爱的情感(如西洋诗人的诗集中之大部分抒情诗)也看作微小不足道”,^{[1]428}以此来观照李白,自然是不足道也了,因为李白的痛苦就不会具有任何普遍意义。可见观点在表面上虽然相似,但在根底上却已经发生根本的转变,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不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普遍人性,而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诗经〉中的政治讽刺诗》是在1948年政治文艺论争达到白热化阶段的时候所写的。这篇文章

所使用的语言已不是李长之个性化的语言,尽管李长之并不回避政治话题,但对批评对象政治内容和意义的强调并不是李长之一贯的批评核心,更重要的是李长之以此否定了青年时代在浪漫主义理念下坚持文艺的任务是对生命力的表现。如何表现批评对象的情感和理智是李长之一直以来处理文学题材的核心内容,是他表现人物生命力特征的关键,但此时却是用来理解政治讽刺诗的内涵:“政治讽刺诗是产生自理智和情感相伴的作品,……近代的政治讽刺诗如此,古代也没有两样。”他进一步说:“《诗经》中的恋歌是好的,《诗经》中的政治讽刺诗也一样的好。恋爱在人生中诚然重要,所以弗洛伊特没有错。但是还有一件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的事,那就是吃饭,所以马克思更没有错。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3]438}这同他在《〈热风〉以前之鲁迅——鲁迅批判之七》中辨析吃饭的现实需求与浪漫的精神追求之间的关系后特别坚持浪漫主义具有更高价值和意义的态度是截然相悖的。政治讽刺诗对此时的李长之而言无疑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因为它是老百姓(人民大众)心声的反映,比那种“缺少明显的政治主张,呼喊也多半是由自身痛苦而起”的作品伟大,前者表现的是“怒”,是康德所谓的壮美,后者则是“苦闷”,是自我崩溃,屈原无疑属于后者。^{[3]450}这与在1947年的《诗人节献词》里盛赞“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在态度上又显然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在此回溯1942年《孔子与屈原》一文中李长之对屈原的态度,可以明显看到李长之面对现实历史的动荡时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历程。即便是对被树立为最高的完美的理想人物孔子,李长之此时也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在1948年10月的《孔子可谈而不可谈》里,李长之已经不再将孔子视为理想的人格,而是立足于当下现实之可能性对孔子做出评判:“一是把孔子还归一个长期的封建时代,凡是那些助长封建势力的说词一律用历史的钉子把它钉牢,不必让它和现代生活有何关涉;二是把孔子人格之带有永恒性的价值洗练出来,洗练包括批判;三是用发展的眼光,看看孔子为后来恶势力所利用处,

都是经过如何的路数,免得我们再蹈前辙。假如这三样做到,而又恰是在恶势力解体,人们又不再怀念恶势力之时,孔子可以谈!”^{[1]440}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影响了李长之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视角,将他从抽象地谈论个体生命的精神拉回到现实生活之中,在“古典”与“浪漫”精神相互作用下对中国文艺复兴的想象和期待似乎成了梦幻泡影般不再被李长之所谈起,而唯独被保留下来的“救世”精神被现实地诠释为政治立场的选择和行动。“人民大众”“老百姓”之类的具有集体性质的概念召唤着李长之的“救世”热情,成为“世”的主体内容,在这类概念的衡量下,“个体”、“生命力”、“情感”之类的概念似乎被李长之所放逐,又或者在李长之的理解里,这类个体性的概念应该通过他自身的实践活动融汇到这个“世”里去了。或许是他所崇敬的德国思想家洪堡“国家”和“个体”相统一的观念也给了他这样的影响。而“国家”在这个历史阶段被理解为一种政治选择,李长之努力融入的其实是一个政治团体。他接受了这个政治团体的指导思想,并努力将其融汇到自己的批评活动中来。

二、《陶渊明传论》:政治观念与文艺批评观念的协调与整合

于天池指出:“《陶渊明传论》的写作时日虽短,所论虽然主要限于陶渊明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态度,表述的却是作者较长时间内萦绕于怀,在认真思考基础上的比较固定的一些看法。”^[4]这其实就已经指出了此时萦绕在李长之心头的关于如何以新的观念进行文学批评的问题。阅读这本传论的一个直接感受是社会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冷静客观的姿态取代了如《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令人心潮激荡的极具个性化色彩的风格。李长之从陶渊明的诗里体会到的主要不是陶渊明个体的心灵世界,而是陶渊明的政治态度。如果说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里李长之主要是将司马迁放置在大文化背景中考察的话,那么《陶渊明传论》则把陶渊明放置在一个政治环境中去塑

造的。在唯物历史观的框架里,陶渊明“是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人,能够写出儒家所称赞的封建社会道德和封建社会情感”,“他在诗文中表现的封建地主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十分明显”。但是“他模模糊糊体会到了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之后,就有了被剥削的穷人”,“《桃花源记》代表陶渊明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使他在生死问题方面“接近于唯物论思想”。^{[2]605,608,583}但李长之显然不满足于将陶渊明塑造造成如后来撰写的李白那样一个完全被政治意识所涂抹出来的符号,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其塑造人物时所坚持的“性格”因素,力图在这种政治话语的缝隙中表现出陶渊明具体的生活、性情和情感。他在文章开头就表示反对机械唯物论的写法,而是从陶渊明对其先辈异乎寻常的崇拜入手去探讨陶渊明的性格和政治态度,以及风度、爱好、习惯等的形成。对这两位前辈的描写既不是政治符号式的,也不是个体精神投入式的,而是除了指出他们的政治取向外,也将他们独特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来。例如关于陶渊明的岳父陶侃,“可见陶侃本来不想出兵,出了兵又后悔,只因想到爱子被杀,但也是别人借此激怒,采取打仗的。他对于晋室是多么冷淡?不但冷淡,想到‘不在顾命之列’,还‘深以为恨’呢。”^{[2]531}孟嘉是陶渊明的外祖父,是当时的风流名士,李长之通过陶渊明为其作的《传》展现了这位名士的风度。对于陶渊明,李长之所表现的是他的性格与现实政治环境的不相容所产生的矛盾、痛苦、寂寞、孤独以致人生虚无的感受,而不是以一种外在的观念来理解陶渊明的心灵。他所追求的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发表于1957年1月的《陶渊明》里,李长之道出了写《陶渊明传论》的些许观点:

可是我在这篇文字里,没有用现实主义的字样,也没有用人民性的名词,同时也没有提到他的劳动生活的意义,并且没有提到他的朴素的风格,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提法不好,也不是因为这些提法不重要,只是因为我怕如果不通过详细说明就有简单化的危险。简单化也就是歪曲的别名。以陶渊明时代的历史情况论,以陶渊明所接受的

思想来源论,以陶渊明和当时的文艺流派的关系论,以陶渊明创作中的复杂情感论(几乎每一首诗都是如此),以陶渊明的含蓄而丰富(表现上很朴素)的风格论,都让人不能够简单地来理解陶渊明的。然而我要重复说一遍,避免简单化,不是说不理解,也不是说不值得理解,而是相反,倒应该耐心地去发掘这一个伟大诗人的丰富宝藏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其中吸取更多的有益的东西。^{[3] 590}

联系到1956年前后的政治背景,李长之此言显然是针对当时的文艺现状所言,但又何尝不是李长之进行文学批评的操守。表面上《陶渊明传论》表现出政治话语的特色,根底上仍然是李长之文学批评观念的坚持,当然,如果剥除掉这些话,并不一定有损陶渊明的形象。但我们却不能就此断定这是李长之以暗渡陈仓的手段处理与政治话语的关系,因为李长之是真心觉得社会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文学批评具有某些合理性的。这一点在分析李长之对茅盾三部曲的批评时已经有所指出。他实际上关心的不是某种批评理论本身是否正确,而是这种批评理论用于批评对象身上是否合适以及如何批评。因此,本文以为,《陶渊明传论》是李长之协调自身的批评观念与政治文艺观念的代表作品。

三、观念的趋同与想象的冲突： 关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分析视角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于1930年代,特别是1942年以后的历史态度,似乎非常强调以革命的政治的名义对个体生命意志的压制导致作家和文学集体向政治权力的臣服或屈服,以此指责政治权力对文学创作蛮横无理的干预。一般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政治权力从文学领域里撤出,文学就能恢复民国时期的活力并且发展得更好。坚持文学创作个性和自由,拒绝政治意识形态对创作的主导,这显然是尊重文学规律的。但以此作为文学史的研究态度,本文以为有失于简单化之嫌。

从总体上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个性

自由到1949年中共政权领导下的集体化意识形态要求思想观念和公共话语的统一性,似乎已经作为历史事实为中国现代史所接受,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大体上也在这个历史框架中构建。这段历史之所以作为事实并不只是在于它已经如此呈现,而在于如此呈现的必然性,即历史只能走向这样一个方向,本质上不在于是中共政权还是国民党政权取得领导地位,而在于这段历史本身所内含的矛盾最终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概括而言,这段历史内含的矛盾不外乎个体自由与集体意志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不断呈现为历史社会事件,而且也存在于具体的历史中的人的观念之中。在这些人之中,有学识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们一方面希望通过国家的集体意志去实现民族的独立,一方面又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保持自己个性的自由和独立。而到底应该将哪一个方面作为逻辑思维的起点才能为此在构建起真实意义呢?这个问题因没能得到严肃的对待而显得含混不清。这种含混不清在文学活动中表现明显。在左翼与“京派”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基本面貌是政治性的集体话语与文学性的个人言说之间的冲突,但我们的研究不是已经发现在左翼阵营里同样有着强烈的个人性质的话语方式和追求吗?比如被称为“第三种人”的苏汶、胡秋原、施蛰存等人因为不满左翼的政治性质而从左翼阵营里分化出来,自由办报自由言说,却遭到左翼的围攻。而“京派”团体里不也有着一种集体性质的观念吗?如何复兴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则是“京派”团体从事文艺活动的目的,这个目的本身就带着浓厚的启蒙气质,带着极具审美化理想主义的色彩,特别是在民族尊严和国家存亡的时代里,这种审美化的趋势愈加强烈。从根本观念来看,人类、国家、民族等集体化的观念都是“京派”和左翼活动的基本观念,“京派”同左翼在文艺观念上的冲突实际上是对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不同想象的冲突,只不过表面上呈现为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的冲突而已。这场冲突的最终结果是左翼的集体化观念以具有现实性力量的政治革命方式全面压制了“京派”审美化的民族国家想象。

这一点在李长之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1946年以后,李长之所谈论的民族国家就已经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与《迎接中国的文艺复兴》里的民族想象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意味着他必须协调好个性色彩与集体文艺所要求的统一性的关系。而“文艺复兴”之类的话语则明显带着反动色彩。他对文学中政治意义的追寻构成了他这段时光里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因此,认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根本内容是以政治权威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观念对现代个体观念的压制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本文以为“京派”和左翼的这场冲突是两种不同的集体文化观念的冲突,只不过在这个冲突里,裹挟了一些现代的个体性观念,使得中国现代思想呈现出十分复杂斑驳的现象。这些个体性观念在政治权威薄弱的时候以追求国家民族的集体性名义迅速地成长起来。而也正是这些个体性观念的存在使这段历史里的个体生命面对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感到彷徨与挣扎。而对于这些个体生命来说,他们觉得存在的意义必须通过国家民族的现实性体现出来。而“京派”的审美化的民族国家想象显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

为其带来现实性的效果。这种现实性最终被左翼的集体化观念实现为政治权威,与现代的个体性观念是完全不相容的。因此,对这个历史阶段里初步拥有了这种个体性观念的个体生命而言,现实的痛苦遭遇是避免不了的。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我们倒不应该过分地指责这段历史里政治权威对个体性观念的压制和绞杀,把当下的问题过度地抛给历史来承担,这并不是可取的历史态度。这并不是说要斩断当下与历史的联系,而是要避免对历史产生无尽的恨意。这种恨意无助于我们对历史做出客观理性的评断,反而极有可能陷于将当下抛入历史虚空的境地。就这段历史而言,政治权威的确是蛮横无理地造成了许多生命的悲剧性命运,而这些悲剧性命运的形成是在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出现的,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说,这些悲剧也是人类历史的悲剧。我们不应当回避这种悲剧的历史事实,当然也不能不做出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价值判断,但是如何把握好一个历史的度,就不是价值判断所能论断的,需要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李长之.李长之文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2]李长之.李长之文集:第六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 [3]李长之.李长之文集:第七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4]于天池,李书.说说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李金龙)

and elegant style. These ballads express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of the local people, and the local expressions demonstrate their grassroot characteristics, what is more, as the ballads are taken to the overseas countries, they adopt foreign words, which give them a charm of marine culture.

Key words: Chanshan ballads; vocabulary; ancient words; local words; foreign words

A Study of the Works of Xu Xinying, a Chaoshan Female Writer

LIU Wen-ju LI Jian-cheng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Guangdong 521041)

Abstract: Xu Xinying (1908–1958) was a female writer born in Chenghai. Originally named as Xu Lansun, she used Bai'ou as her pen name. She inherited her father's cultivation in Chinese studies and specialized in classical poetry. She also inherited her father's work of vernacular writing pioneering in Chaoshan area, composing modern lyric poetry, prose and novels. Her brilliance made her well known in the Chaoshan literary world at an early age. From 1926 to 1934, she was studying and living in Shanghai as a famous woman writer. After 1934, she returned to Shantou to teach for a living. She wrote in her spare time and published many poems and articles in local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Prolific, elegant, romantic and sentimental, her works reflect the mentality of modern women in pursuit of self-liberation. Unfortunately, most of her works were lost and forgotten by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the author collects some of her works through document search and oral interviews to her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 order to restore her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native of Chaoshan; Xu Xinying; works; research

Lukacs on the Metaphysics of Tragedy

XIAO Qi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Yunnan 650221)

Abstract: Lukacs is the founder of both western Marxism and modern tragic theories. But studies on Lukacs in China exclusively focus on such concepts like totality, materialization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tragic theory of the early Lukacs, especially his essay "The Metaphysics of Tragedy" is neglected. "The Metaphysics of Trage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gedy and modern societ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constructing metaphysics. For the first time it emphasized the metaphysical level of tragedy and its ethical realistic requirements. It influenced the tragic theory of Benjamin, Goldman and Eagleton.

Key words: Lukacs; the hidden God; metaphysics of tragedy; tragic ideas

The Reading Politics of British Marxism: Cultural Hegemony and Reading Construction

ZHOU Hai-li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hantou Polytechnic, Shantou, Guangdong 515041)

Abstract: Poststructuralist literary theories deconstructs the ontological position of the text, and consider readers and reading activity as the origin of meaning. Readers are examined in the reading practic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ders and social culture is foregrounded, which makes possible the intervention of British Marxism. Theoretical readers become cultural political readers different in race, identity, age, class and gender. With its turn to Gramsci's cultural hegemony, the elitist reader theory gives way to a reading politics of popular readers, popular culture and popular reading, all of which are given political values and practical political strategies.

Key words: cultural politics; cultural hegemony; popular culture; reading construction

Tao Yuanming, a Critical Biography: the Pain of Reality

—On Li Changzhi's Comment on Tao Yuanming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deas

MA Zhi-jin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s the major part of Li Changzhi's work. It not only embodies Li Changzhi's ideals of personality and national culture, but also demonstrates his change in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hoice. Although he used highly individual discourse, in essence it was different from modern individuality. This discourse embodies an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different from the political approach. All conflicts are the subject of Chinese history ever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n China was becoming a modern nation state.

Key words: Tao Yuanming; "vitality"; political choice; concept of individuality